

【编者的话】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表现独树一帜，辉煌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打工者更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当年人物，被誉为带给危机中的世界全新希望的力量。然而这些贡献巨大的打工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打工者子女在地方上接受教育往往受到多种限制，应运而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命运多舛。毋庸置疑，一个人在知识技术瞬间更新的年代，缺乏应有



的教育，被主流社会丢弃一旁，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失去了在社会中上升的渠道。而这正是当代农民工子弟所面临的命运。

最近北京市教育当局强力关闭数十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及幼儿园，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针对此事，本期 1510 电子周刊采集多篇精彩文章，力图提供给读者一个多方位的角度，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二元社会之下，当代农家子弟的处境、他们与城市社会的关系、以及城乡隔离制度将可能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从农家子弟和乡村的视角，潘晓凌和十年砍柴的文章具体地展示出农家子弟出路狭窄，升学无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觉前途渺茫，对未来不报希望的现实问题。而在另一个极端，傅剑锋的文章则通过暴力犯罪团伙在一些乡村遍地开花，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读者看到日渐没落的乡村里，人生无望的强梁者如何铤而走险，刀头舔血。

郭宇宽、张天藩、盛洪的多方位刨析，则从城市的视角，道出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扭曲成长历程，以及关闭学校的非理性与非法性。从更加宏观的角度，以近期前所未有的农民工骚乱为例，徐佳与黄章晋的文章勾画出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日益复杂的城乡社会关系与利益冲突。最后柏蔚林的文章提出，如果不能把农民从“贫困陷阱”中解放出来，解决中国发展战略中的悖论，随着农民和农村贫困化的加剧，中国社会的未来堪忧。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在 Google Buzz 分享本期周刊



【困】

8-1 潘晓凌：穷孩子没有春天？

“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 60 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 5 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 2009 级 1 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 22 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 1978~2005 年近 30 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 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 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 2010 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 2010 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 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 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 1990 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 年 12 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 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

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今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

“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没有了。”廉思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 年 5 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 39%提高到 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 33%升至 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 17 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 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 34 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 7.9%与 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那扇门在高考前就被关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庆幸，自己在上帝关上门的前几秒及时跳了出来。这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 24 岁女孩，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一学生。







儿时，这名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的女生就被家人告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命运，要么念书，要么参军。她的伯伯与堂哥，就是通过参军，在城市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上世纪 80~90 年代中期的高考升学率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 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 20%-40%之间，1980 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仝十一妹的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中考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为成绩一路优异的她报考了衡水中学。在这所将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的军营式河北省超级中学，仝十一妹与来自全省最优秀的同龄人度过了紧张且竞争激烈的三年，2006 年，她以年级第 15 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一年，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共 42 名，占据两所高校分配给河北省名额的 33.87%。

“如果我当时留在县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说，那一年，她所毕业的县城中学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线名校。

这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征兆。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

清华大学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的本科生调研团队以陕西省为样本，统计出当地两所超级中学在 2008-2010 年 3 年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全省名额的六成余，过去七年，陕西省的 15 位文理科状元，11 位来自这两所学校。

这是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的结果：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不平等的起跑线

超级中学的出现，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陕西超级中学调研数据显示，2010 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 98.9%、保送名额的 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 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 70 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 10 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 60 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他们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

这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这台隐形的抽水机还在继续高速运转，向上抽离的垂直距离还在不断延长。

“如果再晚生几年，”仝十一妹说，“我家没条件送我到县城读小学，我就没有办法考上县城中学，更没机会进衡水中学，进不了衡水中学，考北大？根本不敢想！”

教育学者杨东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现状。在他看来，这一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的竞技教育。

“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但较之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奥赛等加分，比例与力度显然偏小。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获得。总之，陆铭没有盼来这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荣誉。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 20 分，省优干的加分是 10 分。

自主招生是 2003 年的高考新政，它赋予部分名校招揽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权，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直通名校的，是超级中学与省级重点中学的学生。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新闻学院 09 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十……

清华社科 2010 级的陈美诗则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了一道关于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的题目，她说：“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 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同样作为农村孩子，出生于黑龙江的宋永亮远没有陆铭的学习禀赋与运气。2002 年，他从县城中学考入了黑河学院，1999 年高考扩招后，进入类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这所县城中学学生最寻常的出路。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几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2000 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 1980 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 1998 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间培训学校做销售经理，经过 5 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环外一间早上醒来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租屋。当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学都回去了，在县城，或周边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学院的文凭，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热爱北京。这座城市与他从未有机会上过的超级中学一样，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二十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他的农村老家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俨然是另一个世界，节奏缓慢，机会寥寥。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他不喜欢笼罩着家乡的失败人生的气味。

陆铭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陆铭为化名）

（潘晓凌，媒体人。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61888）

【返回目录】

8-2 十年砍柴：民工儿女已长成



“那些已经进城几年、年长几岁，从 事一些非法行当的同乡青年接纳了他们，先并不着急让他入伙，而是让他吃让他睡。时间稍长，这人就不好意思了，哪能总这样吃别人的？于是跟着人出去，先是做‘望风’之类的外围工作，后来看到以贡献大小来分‘战利品’，就会主动要求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去年 12 月中旬，因公回了趟湖南，顺道去长沙以西约 300 公里的一个山村探望了父母。然后再折回长沙，乘机去深圳。在候机室百无聊赖，买了份《潇湘晨报》-----这是我很尊重的一份报纸，因为给它写了两年的专栏，更觉得亲切。

首版大标题导读的，是令人高兴的消息，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排在第二，周刊采访的人物中，一多半来自湖南，其中有几位女工和我同一个地区。阅读记者采写的报道，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农村女青年外出打工，似乎比男青年更能适应工业化生产，也更有成就；二是被采访的女工中，只有一位未出嫁的 80 后，其他多在 35 岁左右，早为人母了，算是我的同龄人。而在一篇深度报道的标题很刺激人的眼球：《11 岁女生上学途中被绑架湘粤 400 余警察解救》。一位女初中生被绑架，两省数地公安联手侦查。最后湖南警方在谭邵高速和 312 国道交叉处将绑匪抓获。案子的成功侦破多亏参与行动的一位刑警，联想到几年前破的一个绑架案，绑匪就要求在这个地方交赎金。因为高速公路在国道上方 10 米交叉越过，绑匪遥控指挥，让家属在高速路边停车，将钱装进包里扔下，绑匪在国道上接到钱后，能迅速逃离。------可见，绑架案在我的故乡，已非偶发。



在家中停留的那一夜，父母和我聊起周围村庄一些故事，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是：许多后生崽学坏了。往往一个村的年轻小伙，成群结队地去南方偷、抢，而且村和村各有特色。有些村的人以扒窃为主业，有的村以收保护费为主业，有些村，以绑架为主业。临近我家 2 公里的一个村庄，坐落在群山环绕的一个小盆地里，我少年时，特别羡慕这个村的富庶。这个村据说有十几个小年轻在广东绑人勒索钱财。就在年初，几个人将一位 50 多岁的人绑架，堵住嘴巴，扔进汽车后备箱，后来老头活活憋死了。案子破了，4 个绑架者被抓获，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一人被判死刑，其他三人分获不同刑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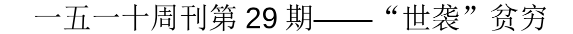
这个话题说起来实在过于沉重。这几年，老家农村的基础设施和植被恢复都很不错。水泥路、电话、有线电视通到了每一个村；由于青壮年大量外出，山野里的树木茅草疯也似地生长，无人砍伐；山窝窝里一幢幢新楼房，外面贴着瓷砖，这些都凝固了主人打工攒得的全部钱财。但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是，第一代民工业已长大的儿女们的未来，令人忧心忡忡。

那些出去不学好的年轻人，大多在 18、9 岁，20 来岁，有的甚至还未成年。他们的父母，多是 50 年代末，或者是 60 年代生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工。这些年轻人曾经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上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打工潮席卷湖南各个乡村，无数青年男女南下广东，一夜之间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由于这些人绝大多数在流水线上，不可能像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那样把孩子带在身边，他们的儿女，只能留在故乡让老家，由爷爷、奶奶拉扯大。

爷爷奶奶带孙辈，问题实在太多了。一是娇惯，二是无法督促他们的学习。特别是 1999 年扩招以后，由于大学生的基数大，就业难度加大，这对农村孩子的未来而言，是雪上加霜。因为就业比的是父母能耐，农村人是最现实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考大学时，已经不像过去，大学毕业笃定有个工作，而学费又那么高。于是，没人父母管教的留守儿童、少年们，更是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就这样糊里糊涂地长大了。

一长大，突然发现要找出路。当兵？当兵没文凭的照样会退伍回家，何况现在大学毕业生都抢着去当兵。种田？还有几个农村青年会种田？故乡的老辈人叹息说现在的后生连怎么牵牛下田都不会了。做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一年到头在流水线上，加班加点挣那点辛苦钱，还可能落下职业病，太划不来。但无论如何前途渺茫，读完初中的乡下青年，进城，几乎是他们必





然的选择。进了城，吃闲饭，讨厌在成长期很少照顾自己的父母以及其他长辈的唠叨，只有找年龄相仿的同乡，才觉得生活有意思。就这样，那些已经进城几年、年长几岁，从事一些非法行当的同乡青年接纳了他们，先并不着急让他入伙，而是让他吃让他睡。时间稍长，这人就不好意思了，哪能总这样吃别人的？于是跟着人出去，先是做“望风”之类的外围工作，后来看到以贡献大小来分“战利品”，就会主动要求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就这样，本来一个良善的农村青年就上了贼船。而这样的后备军，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近几年回家时，父母以及留在村里的一些老人，总在感叹风水变了，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你们那时候攒劲读书了。——上世纪 80 年代，本村的学风之盛，远近闻名。从 1977 年底恢复高考后，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1984 年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奇迹"——村里一位老兄以全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录取。

老人们以为风水变了，其实是社会变了，这种社会的变化，使农村青年靠读书、当兵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变小了。我庆幸自己在上世纪 80 年代完成了度过了少年时光。包产到户时，我还在读小学，在上世纪 80 年代最后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整个 80 年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回光返照。农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农民为自家干活，积极性空前高涨，温饱问题解决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当时多 40 多岁，已经不可能出去打工了，只能带着孩子在家劳作，孩子们的吃苦耐劳能力得到锻炼；而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以及较少的招生数，农家孩子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在这种剧烈的竞争下，即使没考上大学，高中的教育质量也是相当过硬的。我们家族三叔侄同一年考上高中，后来除我正常考上大学外，一位族兄去当兵，在部队里考上军校；另一位族叔，南下广东打工，因为是高中生，干活也卖力，做到工厂的技术骨干，后来把户口迁过去了，在那里买房安家。我在老家的同龄人中，出去“学坏”的也有，但很少。这不是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尽管我们那一代人成长时生活更清苦，但那时候的社会，好像提供走“正道”的机会更多，希望也更多。

1999 年的冬天，我刚进一家报纸当记者，采写的第一篇深度报道是：《进城乡下娃，你的课桌在哪里？》。我当时采访的重点地区是北京立水桥一带河南人聚集的“垃圾村”，那里的河南进京者主要以废旧物质回收、垃圾分类为生。他们从老家延聘了一些代课老师，租几间平房办“打工子弟学校”，而一部分人的孩子，还在老家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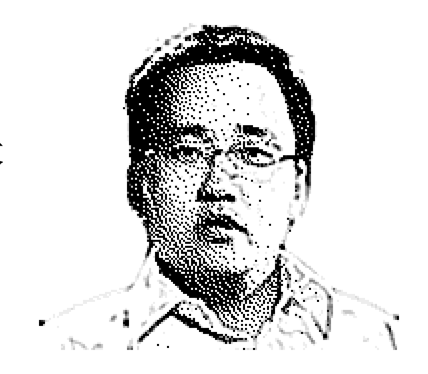


十年过去了，丽水桥那一带已非当年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城郊面目，而是高楼林立，出入多白领。那些捡垃圾的河南老乡们，去了哪儿？他们那时候还在上小学的儿女，已长大成人，现在何处?正在干什么？思故园，看京华，我以为答案并不那么乐观。

（十年砍柴，原名李勇，作家，现供职于语文出版社。原文链接：http://kanchai.blog.caixin.cn/archives/1925）

【返回目录】

8-3 郭宇宽：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恶政之花



“恰恰是因为你使这些孩子在北京受不到合格的教育，最后他成为‘街角青年’，完全被社会主流所排斥，不能进入发展渠道，他才会最终对当地社会造成压力。”

（编按：此文根据法广记者对郭宇宽的专访整理。）

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最近北京市关闭打工子弟小学事件的主要概况？影响到多少学生？

北京市对打工子弟小学的拆迁其实是多年来一直在持续的。今年据说是一共有 36 所学校受拆迁影响。现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平均规模是 600-800 人之间，因此可以估算出大概有两万孩子受到直接影响。

拆迁其实每年都在进行，但这次北京市政府已经稍微注意到一点，用比较人性化的方法。之所以选择假期时间，是想避开打工子弟非常集中的时段，来减小社会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因为微博等互联网手段的发达，再加上和郭美美事件和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结合在一起，很多社会情绪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所以使得这次拆迁造成的社会影响格外之大。

北京市教委曾经承诺不让一个打工子弟失学，那么就您了解到的情况，这一点落实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次落实得比以往要好。以前北京市教委承诺不让打工子弟失学基本上是一个权益之计，只是说说而已，甚至自己都没把这个当真。此前北京市教委主任甚至公开表示，说北京

这么大，打工子弟这么多，我们不可能都解决。而且解决得太好，造成“洼地效应”，对北京反而不好。但是这次北京市教委正式提出不让一个打工子弟失学，而且对应地做出一些政策安排，比如附近哪些学校接收打工子弟，应该说这个政策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洼地效应”：一个伪社会科学概念

您刚才提到“洼地效应”，我看您的研究成果里也很多次提到这一概念，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北京市近年来城市发展失控，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集中，给城市管理造成一些压力。于是近年来北京对于控制城市规模要求的力度特别大，甚至把这一点当成排在前几位的政治任务，就是一定要把北京的人口控制住。但是怎么控制住？非常不理性的做法是把一些弱势群体当成控制的目标。北京市明确地说，要控制低素质人口进入——它觉得那些打工者就是低素质人口。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打工子弟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我所知，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上一届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受他上面领导的影响，要求北京不能把打工子弟的教育搞得太好，否则就会有“洼地效应”。所谓“洼地”就是说一旦有了水坑，雨水积在这里流不出去。他希望把打工子弟的教育搞得差一点，那么就不会有一批打工子弟留在北京不走，就不会产生“洼地效应”。这就是他的简单设想，这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北京市领导的指导思想。

按照北京市领导的想法，给打工子弟比较差的教育，他们就不会留在北京了，就不会有“洼地效应”了，结果这个逻辑是恰恰相反的。恰恰是因为你使这些孩子在北京受不到合格的教育，最后他成为“街角青年”，完全被社会主流所排斥，不能进入发展渠道，他才会最终对当地社会造成压力。



我们知道您在主持一个研究项目，关于京沪两地打工子弟就学情况的对比研究。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从 2008 年到现在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

我们从 2008 年开始做这个课题，想做一个长时段的跟踪，就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各跟踪 500 个打工子弟，看他们的发展情况。

2008 年时北京和上海的孩子起点是一样的，都是在打工子弟学校。但是到了 2009 和 2010 年渐渐发现，上海的政策是把这些孩子都吸纳进了公立学校，或者把原来的打工子弟学校转制变成了非营利性学校，这就意味着这些学校的财务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政府的监管，同时给予财政补贴。（上海的）生均经费一开始是一千多，后来涨到了两千。相对来说，这样的学校保持了比较好的教育资源，这些孩子从学习成绩、精神状态等各方面都让人感觉到和北京的打工子弟不一样。

那么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这一种纯营利性模式，再加上政府给他的政策预期不稳定，加剧了短期行为设想，往往是有一笔捞一笔。

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劣胜优汰”。比如说，很多人看到打工子弟学校好像很可怜、很穷，它的学费一个学期八百块钱，显得也不是很高，但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一方面压低教师的成本，教师一天上七八节课，一个月的工资在 2008、2009 年是 800 块钱，现在也就是 1000 出头，这在北京也低于做保姆或者最基本劳动的收入，而且这些工资还不能按时发放，另外一到假期就没有工资了。

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一方面压榨教师，另一方面孩子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们“乞讨”的工具。很多人来到学校，一看教学条件这么可怜，就给捐钱。而捐钱给了校长，最后往往都进了校长自己的口袋，或者在别人来参观的时候，展示自己买了一些东西，之后再把这些东西卖掉。还有我知道的事例是，有些校长称孩子冬天没有暖气费，出去向企业要求赞助。等他得到了这笔钱，还是不烧暖气，再去向别人要钱。这就捆绑孩子成了他的乞讨工具。

学费只是这些学校收入的一小部分，它们还要从伙食里面赚钱。因为打工子弟一般要在学校吃饭，每个学生每天的伙食最少也能挣一两块钱，而这都是由校长的老婆或者亲戚开办的。有的学校还开办小卖部，很多劣质的零食小孩爱吃，又能赚钱。



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破败不堪，老师的待遇低下，完全没有教学的积极性，而校长在接待媒体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讲他办学多么艰辛，但是据我们内部的了解，一般每年上百万的利润是非常轻松的。

您在研究成果中把“洼地效应”背后的心态，归结到北京在集权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导致了政策制定者——甚至是普通的北京市民——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目前集权政治的模式不改变，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得到制度性的解决？

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根本解决，肯定是要靠放开户籍制度，不要用户籍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或者是他享受的基本资源。就像义务教育，这应当是由国家来保证的，而不是用户口来划分的，这需要一场大的改革。

但是，在现有的微观体制下，是不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必须期待宪政？我觉得倒也不是这样。因为北京的政治敏感性和权力的集中，一方面使得某些问题可能被掩盖、被压制，但另一方面，一旦这些问题被暴露出来，使它盖不住的时候，它解决问题所投入的资源和力度比其他地方要更大。我相对来说比较乐观。尤其是这次通过互联网上不可遏制的群众意见，对于北京市当局产生的压力，最后会使得政策向好的方向回归。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问题的可能出路

你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有很激烈的批评，但同时又表示不能怪这些校长，因为他们是目前恶政之下必然出现的现象。那么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尤其是在北京这个环境里，怎样去规范这些校长？上海的“公有化”或者“购买服务”的政策是不是唯一出路？

这肯定不是。我觉得在目前的体制下，上海做的努力非常积极。但另一方面，我并不反对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以营利目的办学，市场也能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广州的模式就是政府承担的责任比较少，彻底地放开市场。



在广州，基本上你一办打工子弟学校，政府就给你发许可证。而且广州不搞大规模拆迁，北京的不靠谱之处在于，今年盖的房子，到了明年就马上要拆迁，而广州保留了很多城中村，有廉价的租金可以办学。一旦有了一个稳定的预期，就使得这些学校之间也有比较开放的竞争，而他们的竞争就要比教学质量。有的人也许一开始想赚钱，到后来也想提升自己的品位，最后把自己当成一个教育家来行事。一方面他自己赚了钱，同时也有心把这个事业做好，长期办下去，那么他就对孩子的教学这方面比较重视。这就和北京这样没有稳定预期，所以捞一笔算一笔、“穷凶极恶”的办学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比较好的方式是上海和广州两种模式之间的结合：一方面，政府多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能够放开民间，让民间的办学力量能够作为一种补充。

您觉得要破解北京的这个难题，最可能的方式是什么？从什么地方入手？

目前来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充分、真正的信息公开。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北京每年为解决打工子弟教育问题花费 50 亿，这个统计口径肯定是有问题的。上海给每个孩子花两千元，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而北京一年花 50 亿却把问题解决得这么糟糕，这就说明花钱的效率和资源配置绝对是有问题的。

另外，我们经常有一些比较模糊的数据，比如说解决了 70%的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样的 70%？真正最需要的孩子是处在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下？他们享受到的生均教育资源，北京市给了多少？中央给了多少？我们目前最需要的，就是有社会科学意义的、讲道理的、理性的研究，同时需要政府信息公开的配套。

您的研究成果中已经花了很大篇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政策制定的初衷和实际结果背反的现象。您觉得自己的逻辑能说服政策的主导者、使他们改弦更张吗？

原来这种混账的、伪社会科学的思路影响了北京的最高领导的决策。而中国的决策体制通常是：最高领导一拍板，其他人就都不好说话了。至于我的成果会不会被领导看到？领导是可



能没时间看到这种东西的，但是这次通过社会上的强烈意见会促使领导重视问题，这时我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可能会影响决策层中的其他人士。

我相信，原来体制内的明白人，即便明白，领导发了话他也不好说别的。现在通过我的研究可能会让他明白，其实洼地效应并不是这么一个道理。把这样的道理解释清楚以后，这就是对于政策的知识干预，使他能够真正把背后的道理理解清楚。

您提到了法国 2005 年的郊区骚乱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到中国从来没有给移民提供过任何形式的住房的福利，他们大多住在类似棚户区的城中村里，这是一个比法国更加严峻的、像定时炸弹一样迟早要爆发的潜在矛盾。您的判断是怎么做出来的？这种矛盾可能会以什么形式爆发出来？

这些棚户区的孩子目前之所以没有酿成很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意识还没有觉醒。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公立学校其实并没有招满学生。如果家长有充分的公民意识，就可以要求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学。

当年印度有类似的例子，很多好学校不愿接收低种姓的孩子，结果家长就去学校门口静坐：既然你还有这个位置，就应该接收。而北京这些打工子弟的家长并没有很强的权利意识，甚至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我给政府添麻烦了？这其实是霸权意识影响了他们的思想。

但是作为他们的孩子，就不大会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而会像法国的移民那样，要求更多的自由、平等、博爱：我们也在这个城市成长，为什么不能享受基本的公民权？这批孩子成长起来以后，对目前的这种政治统治方式肯定是不能适应的。那么，好的方式是我们的政治目标和手段做适当的调整去适应他们；而不好的方式是当二者尖锐对立的时候，也许会酿成类似法国那样的冲突。





面对民意，媒体如何自处？

你针对打工子弟学校关闭的事情发过四篇微博，有意思的是其中三篇是针对媒体的，只有一篇是针对打工子弟学校本身的。您主要批评媒体记者不深入调查、妄发议论迎合民意。从另外一方面看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打工子弟学校问题成了媒体和民众消费同情心的方式，而没有从社会科学角度去真正深入思考并且解决这个问题？

您的概括很准确。确实，现在的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成本低廉的渠道，使得中国社会中长期被压抑的情绪有一个宣泄口，有一种情感消费和宣泄。

比如长期以来在北京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收破烂的孩子，或者做小买卖的家庭带着孩子，年龄看上去有八九岁，都不上学。这种情景在北京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为什么过去就没有人真正把它当回事？而一旦这个事情被纳入公共议题在互联网上推动，好像每一个人都在一夜之间变得非常有爱心，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相应知识储备和研究，所以有些话在我看来是非常不着调的，我甚至感觉很多媒体记者连基本的文案工作都不做，就发表一些很简单、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被一些利益群体裹挟在议程设置中，被他们所利用，而不能使事件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我觉得很可悲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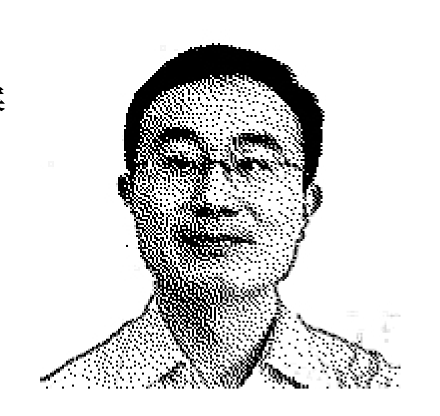
（郭宇宽，媒体人，清华大学博士后。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64040 ）

【返回目录】



【惊】

8-4 傅剑锋：城市里的陌生人——暴力工厂



“2010 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外来工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惊人。”

“入狱五年之后，杀人者阿星终于说出了杀人的原因。五年前，打工者阿星在杀死工厂管工后联系南方周末，坦承报复工厂拖欠工资，并在本报记者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现在，他承认那也是一场有预谋的抢劫。阿星来自一个以‘出产砍手党’闻名的村庄，在阿星入狱前后，他曾经的同乡好友几乎都因抢劫被捕。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进城打工——辞工——犯罪；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数据的缩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以阿星的叙述为线索，南方周末力图还原一群从乡村到城市的年轻人成为‘砍手党’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尊严缺失和梦想破裂的故事，是属于一群在城市化大潮中被离弃和排斥的人群的故事。而如何更好地接纳与善待这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人群，或是避免阿星和他的同乡们的故事不再重演的解决之道。”

在深圳公明马田村，上班与下班的打工者汇聚在交叉路口。这就像他们交叉而过的人生，有些人日复一日地打工，有些人从打工者变成犯罪者。

那是 2005 年 7 月 8 日的傍晚，闭文星（绰号阿星）最后终于无法控制由来已久的强烈自我暗示，用两把西瓜刀与一把弹簧刀捅死了工厂的管工。随后，这名 20 岁的农民工逃亡到深



圳公明镇并找了部公用电话，联系上了曾经打过交道的记者——也就是我本人，然后在我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

他作了一番充满道德义愤的陈述：在辞工时，老板拖欠他 962 元的血汗钱，管工扣押他的身份证并辱骂他，他一怒杀人。

这被许多人视为社会悲剧：逃离凋敝的广西农村，旋又陷入城市的压榨与歧视。阿星在自首时坦承，他的理想只是谋一份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活，攒够钱，在城市做点小生意，不再活得像一个找不到未来的农民工。

这其实只是阿星的一面，五年后我们在监狱里再次相见，他终于愿意坦露自己的另一面：

当时他不只是报复，其实还是一场与另一名同村打工者冯春毫预谋数天的抢劫，虽然他们最后只抢到了 400 元。

在狱中忆起抢劫的念想涌上心头那一刻，他承认那时没有来自道德的羞耻与惊慌。相反，这是他的成长经历长久以来给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赵民显在深圳公明曾是风光无限的“黑社会大佬”，在贫困的家乡最早拥有私家车；常带他玩的表哥言明显，自从辞工后混社会、搞抢劫后就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那时，他们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抢劫这个行当。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广东的媒体上，这座村庄更为响亮的名字叫“砍手党山村”。他们也许并不是在广东作案最多的群体，但却因为曾经发过的几起闹市“砍手”抢劫而震惊公共舆论。

在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温江村，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一百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但又在上映乡其他的村庄遽增，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三四百年轻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抢劫被抓。

阿星迫不及待地从我的嘴里了解家乡的近况。真相让这名死缓犯人的脸上呈现出难以名状的痛苦，每得知一名老乡落网，他都会用双手抱住头，沉默良久。在他入狱后的五年里，他的同乡好友还在陆续落网，连他敬重的老村支书冯成金的儿子与侄子都先后因抢劫被抓。

阿星与他同乡的犯罪被学者们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国社科院在 2011 年 2 月 24 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 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

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外来工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惊人。据警方资料，像温江村打工者集中的深圳公明街道，98％以上的刑事犯罪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犯罪。

多年后，南方周末记者重新调查阿星与“砍手党”核心成员，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化解之道，找寻更明晰的注脚。

进黑社会找“尊严”

阿星在发生杀人案之前，一直被家人、工友认为是一个性格单纯、温吞的少年。那时，他有长长的头发，笑笑的眼神，对城市的一切充满向往。即使在监狱中监禁多年后，他仍能清晰地说出第一次到深圳的新鲜感：坐了一天的大巴，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因为一路上看着夜景，太幸福了”。他刚来深圳是 2000 年春节后，15 岁。他到深圳公明的第一天，就被他的表哥言明显带出去玩。他的这个表哥，后来也曾因抢劫罪被判入狱。

不久，他就初中辍学了，他天真地以为“进厂就有钱花”。他的父亲闭伟宝把他介绍到新兴橡根厂打工。那时，作为未成年人的阿星，还没有自己的身份证。他冒用叔叔闭伟勋的身份证进厂。很快，他发现，挣钱不是想象中容易，每天要在机器前站 12 小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450 块，后来也只增加到 600 元／月。工资经常不够他花，有时就向打工的姐姐要钱去买衣服。

那时，他的父亲闭伟宝已经在新兴橡根厂打工 8 年了，妻子、女儿都已介绍进这家厂做工。这是一家广西人占 80％以上的全球最大内衣辅料厂。通过老乡相互介绍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温江村人投奔了这家工厂。他们聚居在附近的马田村，日常的社交主要局限在老乡之间，仅租住在马田的温江村人就有近两百人。整个马田村，虽然本地人只有千余人，聚居于此的广西打工者却有近万人。他们就像把村子从广西农村搬了过来一样，在马田村，阿星不但能找到同一家族的叔伯婶嫂、表兄姐妹，也可以找到不少小学同学。在深圳，这类城中村里的打工同乡聚居区达 290 个，640 万人。

所以，阿星在那里并不缺玩伴。下班时，阿星最喜欢跟着表哥言明显等五六人去溜冰、跳舞。身上即使只有几元钱，他也要把钱花光，“我喜欢上了城里的生活，当时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呆在农村了”。

那时，言明显已经不在工厂打工了，他做了赵民显的小弟，帮其看场，每天至少能拿到 100 元。赵民显和阿星家同属温江村山岱屯，是阿星的堂叔。在阿星的记忆里，他总是用仰视的目光倾慕这位在老乡圈中声名显赫叔叔。父亲一辈子打工，都没有这位做“黑社会”的叔叔一年的钱多。阿星自认为一个月打工赚得钱，有时还没及表哥为叔叔看场一天拿到的小费多。

就在阿星来深圳前的 2000 年春节，已经在深圳公明镇一带混出了名堂的赵民显开着一辆蓝鸟牌小车回家过年，一时轰动了整个天等县。天等县是一个离中越边境只有数十公里的国家级贫困县，2000 年时，贫困人口还占全县一半以上，达 24.2 万人，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私家车。

现在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赵民显，瘦小、健谈，容易动感情。想起十一年前“衣锦还乡”的那一刻，仍一脸自得。但转而他就自责起来：“这车也把大家都害了。”那时，温江村人已经知道，赵民显是靠在深圳“混黑社会”发家的。在赵民显的记忆里，小轿车开回农村后，不少亲戚与村人这样恳求他：“民显，帮我把孩子带出去。打工哪有你们赚钱。”但当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因抢劫被大规模抓捕后，村里人又认为是赵民显等人带坏了他们。

令村人艳羡的这辆蓝鸟车，是赵民显靠做偷抢勾当所得。但一开始，赵民显更像心地单纯、心系乡土的第一代农民工。1996 年，赵民显 16 岁到深圳公明打工，也进了新兴橡根厂。每天工作 12 小时，拿不足 500 元一月的工资。那时赵民显最大的愿望，只是赚钱在老家盖房。

“像我们这种刚从农村出来的人，对生活的欲望、对钱的欲望，本来都是很小的。”赵民显回忆。温江村土地贫瘠、四环皆山，像赵民显这样的年轻人，赚钱谋生只有两条路，要么去挖矿，温江村很多人都死在了里面。或者去广东打工，“哪怕很苦很累也愿意”，赵民显这样描述刚到深圳时的心态。

8 个月后，赵民显因违反厂规被辞退。此后，他不断找工，不断失业。失业者正是当时的收容制度的施虐对象。他被巡防队员“见一次查一次，查一次打一次”。到后来，他只敢睡在阳台上。如果有巡防队来敲门，他就从阳台上逃出去。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回到温江村，因为家乡太穷，无以谋生。他对深圳有很复杂的感情，心之所恨的是“为什么我在家就没有人查，来这里就经常被抓”。但他仍觉得“这个城市太吸引人了”，站在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夜市里，赵民显生出的感慨是“哪怕你没有钱，你走在大街上，都感觉自己很快乐”。

后来，他和遭际相似的同村妻舅兼表兄杨成康一起，在深圳成了流民。他们开始只是小偷小摸，有时连碗和锅都偷。到了 1998 年，开始跟一名广西老乡学偷摩托车，遂渐进入当地灰色社会。到 1999 年，他们结识了深圳燕川治安队长的钟哥（后被判刑），人生从此真正转折。赵民显、杨成康开始通过钟哥认识马田附近的各路治安队“老大”。自此以后，他们再也不会被收容了。若有老乡被收容，赵民显只要给治安队的人打一个电话，人就放出来了。

赵民显和杨成康也显得慷慨，老乡失业、没有钱，只要有求于他们的，他们就会出手相助。他们的出租屋客厅常常因收留老乡而睡满五六人。

回想这段时光，狱中的杨成康说：“以前我和赵民显打工、失业时，过得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加入了黑社会，才算找到尊严。老乡们，也因为我们增加了一点地位。”

用血债交换“富贵”

也是在 2000 年，赵民显和杨成康控制了深圳松岗的“广西长途汽车站”，暂时告别了“打打杀杀”的日子。车站需要人手，投奔他们成为村里年轻人的时髦。

这家车站实际上就是松岗城区附近一块不足两千平方米的空地，至今仍像一个临时停车场。经常被政府整治，又悄然开张。平时就稀稀拉拉停着三五辆发往广西南宁、崇左、玉林等地的长途车，几名蔫不拉几的拉客仔在附近晃悠。



但这个看起来不显眼的车站，却是灰色社会中的一块肥肉。每年邻近春运时，在正规车站买不到车票的广西打工者们，都喜欢来这里乘车，这里的空地上常常会停满三四十辆车。控制了车站的帮派，每天可以有将近十万元的保护费收入。

这是杨成康、赵民显最早发现的“肥肉”。

1999 年以前，这家自发演化出来的“长途车站”还是一片混乱，各长途汽车竞相拉客。赵民显与杨成康说服天等县籍的司机，动用暴力把其它的长途车赶出车站。垄断后，票价涨了一倍。深圳到广西天等县的车票涨到 150 元，又把春运时期的同类票价涨到 300 元－500 元。他们再从每部长途车票款中收取至少 30％以上的保护费。看场的温江村青年每人每天可以收到 100 元的小费。

这种保护费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血酬”，关键时候要敢于拿命来搏。车站“利润”见涨后，在松岗的湖南帮也想分一杯羹，派出几百人过来砸场。赵民显与杨成康立即开上两部面包车，二十人每人一支雷鸣登枪，一到车站就朝几百“湖南帮”轰过去，对方倾刻间鸟兽散。狱中的杨成康忆起这一幕，还有点得意。

车站当时的“核心团队”就三个人，性格沉稳的杨成康多谋善断，垄断车站的谋划主要靠他。个性火爆的赵民显则经常拿着枪去出头，他们的表弟许国定忠心耿耿地随时听命。外围看场的则是二三十名温江村青年，车站有事时，他们可以立即动员在深圳打工的几百名温江村人和上映乡人前往助威。

其实，在控制车站之前，杨成康与赵民显很少碰过枪支。但有了车站后，他们为了在帮派的争斗中占据上风，就购买了一批枪支武装同伙。他们最常用的是雷鸣登枪，也有仿六四式手枪。由于温江村离越南近，他们有时也从越南购买对越战争时残留下来的军用手枪，“虽然很旧，但杀伤力很强”。杨成康后来被判的罪名中，就有一项是“非法买卖枪支罪”。

温江村人原本在天等县以打群架剽悍闻名，有了枪后，就气焰更甚。脾气火爆的赵民显火气一上来，就用枪指着别人的鼻子骂娘。

赵民显与杨成康还借着已形成的势力，在温江村人聚居的深圳公明镇马田村、合水口村摆老虎机、开赌场，有时日进万金。他们也一度对马田村一带的煤气站、桶装水的进出收取保取

费，渐有称霸一方的气候。他们俩除了拿这些钱还掉家里欠下的几万元债，就是带着一群马仔吃喝玩乐，一天花几千上万元也习以为常。阿星的表哥言明显，有时也会带着阿星一起去玩，这是令这个受尽 12 小时打工生活折磨的打工少年最着迷的一刻。

2002 年，阿星 17 岁，开始厌倦打工。但父亲闭伟宝要求他“一定要进厂，不然就别进屋”。阿星就出走了，他和表哥言明显混在了一起。他跟着表哥去车场、赌场等处看场。在那一年，他还为几名老乡的抢劫望风，他们叫人搭车过来，拿刀逼走出租车司机，然后拿车去卖，一辆车有时甚至只卖几百元。阿星在狱中回忆，那时他并没有参与抢劫。但他对抢劫“习惯了”，“你们抢你们的，不关我的事。被抢的只要是不认识的就行，不认识的比较好下手”。

那时，阿星记住了在温江村年轻人中颇为流传的黑色民谣：“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还有美女抱着睡。”

但车站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了。

另一个天等老板也看上了这个车站，他花了三十万元雇用了一伙“黑社会”。

2002 年 5 月 18 日，正在深圳松岗吃早餐的杨成康和另一名温江村随从被四五个人绑上一部丰田车，随后左右手大拇指被砍残，脚筋被砍断。狱中的杨成康，至今走路仍是一拐一瘸的。

杨成康准备待养好伤后再去寻仇。但赵民显认为，这仇如果不马上报复，就无法在江湖立足，车站的控制权也可能很快旁落。所以，他天天雷鸣登、手枪不离身，嚷着要报仇。

他并不知道对手已经给他安排好了陷阱。2002 年 6 月 25 日，暗战的另一方向公明镇楼村派出所报警，称有劫匪藏身在出租屋，警察遂包围了赵民显的住处，准备用电锯破门后冲入。

赵民显对准门口举起了雷鸣登手枪，他的老婆杨梅秋，也就是杨成康的妹妹，死死地抱住他不让开枪。但赵民显所想的是，要是被抓了，辛苦挣来的车站就没了，他不甘心，无法忍受已经到手的东西忽然消失，最终扣动了扳机。

警察何兆德及治安员陈永光被霰弹擦伤。



他扛起妻子杨梅秋就外跑。那时，妻子已经怀了五六个月的身孕。

冲到楼下，他看到旁边的店门里猛然探出一个头，以为是警察，就一枪打去。霰弹穿过铁门，击中的其实是店里的打工青年李振平。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湖南来深圳打工才不足一周。他最后活了下来，但至今还有五粒铅弹无法从身上取出。

抢劫竟成了“风俗”？

赵民显逃脱了，直到 2003 年 2 月才被捉拿归案，并被判无期徒刑。此时，杨成康还躺在医院养伤。

他们彻底失去了对车站的控制权，但被车站培养起来的犯罪病毒，却从此像潘多拉魔盒那样被打开了。

2003 年，曾最早带赵民显出来打工的堂兄赵民山，也已经从打工者变成了抢劫者。而曾陪着杨成康从车站帮派争夺战中死里逃生的另一个表弟张振武，已与赵民山结伙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在东莞黄江，用枪顶住一个中年司机的头，然后把他的丰田车给抢了。结果发现车上有警官证，原来这是东莞公安局黄江分局一名指导员的车。

尚在养伤的杨成康知道这下坏事了，就叫他们把车卖掉。但杨成康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号召力，他们仍开着这部抢来的车四处招摇。几天后，警方通过小车内置的 GPS 跟踪系统逮捕了他们。

和警察发生枪战也成了温江劫帮的家常便饭。

赵民显与杨成康最忠诚的表弟许国定，在 2003 年再难找到江湖大哥，就与同村人结伙抢劫。

那时，已离家出走半年多的阿星，正和许国定租住在合水口村一间破落的瓦房，这个城中村就在马田村的马路对面，而许国定是阿星的小学同学。在阿星的记忆里，许国定等人持枪去抢时，他也会在旁观战，“砍人、死人的事，那时都看多了。”阿星回忆。

在阿星的记忆里，同村人许国定身材瘦小，家境极贫，15 岁时就辍学去挖矿，差点死在矿里。在深圳等地打工时经常失业，被收容时，腿上曾被管教插上过几双筷子。

成了劫匪后，他在阿星印象里“讲义气”，“腰上总别着两支雷鸣登枪”。2003 年 5 月的一天，许国定开着车回到出租屋，和阿星说，他被警察跟上了，被打了一枪，子弹打在了方向盘上。那时阿星正在煮稀饭，许国定喝完稀饭后，带上两支枪就出去了。到晚上，阿星被告知，许国定死在了合水口村附近的公明广场，车上都是和警察发生枪战时留下的弹孔。

“这一年给我影响太大，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事。”阿星回忆，但他不愿解释具体影响指什么。在他日益深陷这张黑色的老乡之网时，父亲闭伟宝“无论如何不让我再玩了”，他要求阿星脱离在深圳的老乡网络。2003 年 6 月，阿星带着弟弟阿海去汕头的亲戚那里学织带技术。

但阿星耐不住寂寞。到了 2004 年，仍悄悄从汕头往深圳跑，他喜欢和年龄相仿的老乡们泡在一起。

这一年，深圳关外的宝安区，包括当时的公明镇，由于外来人口管理失控，治安成为深圳最差。广东省公安厅从其它城市调动大批警力前去维持治安。

就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震惊全国的抢劫案发生了。

温江村的 19 名年轻人在抢劫时，在公明镇马田村天桥上把打工者余富兵的右手砍了下来，只是为了抢他的手机。一名被抓的年轻人不以为然地告诉警察：“我们整个村的年轻人都是来广东抢劫的。”这名年轻人叫许国亮，是许国定的堂弟，也是阿星的朋友。

这激怒了舆论，也激怒了警察。四五十名温江村籍抢劫者在半年内先后被捕。

但警方的抓捕并没有减弱抢劫犯罪对温江村青年的诱惑，相反它像风俗般影响了更多人加入其中。赵民显解释了村里年轻人的选择逻辑：“我们这个村太穷，又没文化没技术，只靠种田、打工会穷死。去挖矿又可能被压死。挖矿也是死，抢劫也是死，那宁可去抢劫。”

随着警方连续几年的打击，“温江村的年轻人大半已经被抓。”温江村的一名村干部介绍，此村的抢劫风也渐弱。但温江村所在的上映乡，抢风仍炽。该乡的另一个村庄连加村抢风

犹甚。在 2005 年－2010 年间，连加村也有百余名年轻人因在广东抢劫而受刑事处理，其中被击毙两人，至今在服刑的尚有近五十人。

连加村小学校长黎荣慢，曾劝正热衷于抢劫的堂弟不要再干了。结果，堂弟反驳他：“大哥，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么。我可以带你去一趟深圳，我去抢，你来帮我数钱。数一个星期，那时我不让你干，你就可能会恨我了。”他的堂弟不久后被捕，2010 年才刑满释放。

阿星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近乎绝望的理解：“在我们那里，抢就像风俗一样。”

（傅剑锋，媒体人。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61114）

【返回目录】



8-5 徐佳、黄章晋：“城市内战”预言成真

骚乱背后深藏隐患

“他们父辈停滞于城市化进程中半途的尴尬，使得父辈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选择天然不足效法，无法提供奋斗的榜样。……在失去家庭道德权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融入城市上，本身就难于当地同龄人，而无法顺利进入社会，则极容易产生反社会倾向。”



广东潮州和增城发生的骚乱事件，对那些在网上私下传播的视频跟进新闻的亿万网民来说，只能以目瞪口呆来形容。今天，中国网民已习惯将群体事件视为官民矛盾，并习惯在情感上倾向于闹事者，但看到骚乱的年轻人陷入集体狂欢，兴高采烈地打砸抢烧，且完全没有收手打算时，顿时在屏幕前集体失语。

这是超出中国人经验的骚乱。

城市内战，五年前的预言

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迅速增加，但基本都有特定指向性和明确的目的性，来得快去得也快。而潮州与增城骚乱，则是弥漫性的暴力扩散，它仇恨的指向不是吏治问题，不是贪腐问题，不体现为官民矛盾，最终表现为民与民之间的冲突——本地人与外地人。



如果去除掉外部政治因素，且不考虑民族因素，某种程度上它们更接近 2008 年拉萨的“3.14”事件和 2009 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如果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看，它们更像是 1992 年的美国洛杉矶骚乱和 2006 年的法国巴黎骚乱在中国的翻版。

尽管在中国官方语境中，广东这两起骚乱是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但在通常的描述中，它就是一场洛杉矶式的“城市内战”。

1992 年 4 月 29 日的洛杉矶骚乱，由头是一年前殴打酗酒驾车的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四名警察，被法庭宣布无罪。它引发了一场数千非洲裔和拉丁裔参与的打砸抢烧杀。原本要宣泄的是不满白人歧视黑人的愤怒，最终却演变成暴力狂欢，最大受害族裔却是毫不相干的朝鲜人。

这场持续了 4 天的骚乱，在 1 万名加州国民警卫队和数千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镇压下才平息。它波及到拉斯维加斯、旧金山、纽约、西雅图、芝加哥和凤凰城等美国城市。整个事件中，发生了 600 起纵火，有 53 人死亡，其中 8 人被执法单位射杀，财产损失约 8－10 亿美元，总共约 1 万人被捕。

尽管潮州和增城事件一度让大部分国人失语，但并非无人预见这种情形的发生。

增城事件到第三天时，有人发现，早在 2005 年 6 月，青年学者赵晖就在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旗帜鲜明地亮出判断：《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这篇文章曾在新浪和网易两大门户网站的评论频道挂出过，但当时几无回应。

赵文清晰地描述了今天潮州和增城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对立：“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面临这一半与那一半的对立：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统一的本地人，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分裂的移民第二代，他们同在一个地方，却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不一样的权利和不一样的利益保障。”

无论是在潮州还是增城，走上街头引发骚乱的暴力青年，正是文中所言的移民第二代。

赵文虽然大胆推论并准确得出了将要爆发城市内战的结论，但事实却与他对冲突爆发方式的推想截然不同。赵文的推论是：“如果有那么一天，移民第二代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

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

事实却是，这次走上街头的移民第二代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完全是参与者身份不确定的、即兴狂欢式的宣泄破坏。

户籍制度不能解释一切

无论是赵晖，还是此次的媒体评论，将广东两起骚乱的原因和解决之道，都落在了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之上。

从最显性的表象看，中国户籍制度无疑是固化本地人和外地移民的区别，使外地人难于真正融于本地、无法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制度原因。

但是，无论是从国外工业化发展历史，还是与中国本土其他地区的横向对比，广东骚乱事件，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具有足够强大的解释力。

广东原本就是中国户籍制度最松动灵活的地区，在发生骚乱的增城部分地方，近些年出台了“在当地打工 10 年以上可获得当地户籍”的政策，但应者了了。而工业化带来大批城市新移民，并不必然形成本地人与外地人壁垒分明的矛盾和对抗。

另一个反例是，无论是美国的洛杉矶还是法国的巴黎，在城市新移民的福利和权利保障上，都足堪中国榜样，然而却无法避免更大规模的骚乱。

广东的两起骚乱事件，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产物。

它发生在广东，首先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无第二个地区像广东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纳了如此之多的外来移民。如广州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 2:1（50 万：22 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11:1（8 万：7 千），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倒挂的极端典型。

广东承受的这种超强移民压力，自有其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中共建政的前 30 年，在人口流向上逆历史方向而动，不但阻断了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还数次大规模将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虽然 1980 年代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但真正的启动，却迟至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而广东在前三十年被视为沿海国防前沿地区之一，工业投资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又成为最具吸引外资地缘之便的地区。就是说，中国社会本应分摊到 60 年的人口转移压力，集中在 10 多年里释放，最大的压力窗口就是广东。

除却移民超压因素外，中国地域的辽阔和发展的阶梯式不平衡，使中国大陆在城市化移民过程中，还面临着移民与当地人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考验。即便没有户籍制度障碍，这种难以在一代人中消除的外在差别，都会明显形成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心理隔膜。

在中国横向比较，整个北方方言区的中心城市，新移民与当地人的语言和文化生活习惯差异相对较小，本地人与外地人并不容易一见面就能明显识别。所以，地域歧视在北方中心城市同样流行存在，但却无法造就鲜明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隔。

与之相似的是，同样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日本、韩国，几乎完全不存在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因城市居民与新移民存在巨大语言和文化生活习惯截然不同，而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的矛盾和社会问题。

而在广东、福建、浙江、苏南这些吸引了最多外来人口的地区，本地人与外地人在语言、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某种程度上更像吸引了大批外来移民的欧美发达国家。无论有怎样的积极引导政策，移民融入始终是个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广东、浙江可算得上中国最具开放意识的地区。以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为例，在对承担外来人口巨大吸纳功能的城中村，当地政府始终保持着相对温和与包容的态度，虽然它面临着中国独一无二的治安和社会治理压力。

而浙江以温州、义乌等为代表的地区，则因其经济的发展兴起，始于 1970 年代末的大批小商小贩走遍全国各个角落，逐渐拥有了中国最完备的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与理解心态，在接纳大批涌入的各种文化的外来人口时，当地居民相对拥有最宽容的心态。



广东、浙江两省面临的不同人群的文化矛盾和冲突，今天早已超出了汉族内部的南北差别和东西差别，它们不但重构了中国的民族分布，甚至因为吸纳了大批远自东南亚、中东、非洲的居民，重构了中国境内的种族构成。

这些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的考验，远非户籍制度的变革就可一次性打包解决。

骚乱背后更可忧的城市病

无论是潮州还是增城的骚乱，均可见同乡会和黑社会的作用和身影。

在急速城市化的社会重组和重构过程中，黑社会或近似组织的出现，只是城市化过程中阶段性“消化不良”的表现之一。通常与之相伴的，还有城市新移民严重的青少年暴力犯罪现象，毒品、卖淫问题，贫困现象，以及贫民窟问题。

通常，越是大型的经济中心城市，这种问题就越严重。无论是旧中国的上海，还是曾经的日本、台湾、韩国，都程度不一地出现过相似的社会问题。其严重程度与社会财富分配、机会平等、善治手段、社会发育水平高度相关。

由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和城市管理制度，在中国今天的中心城市，几乎没有贫民窟生存生长的空间，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迅速发展，青少年犯罪问题，新移民的贫困问题已经非常严峻。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研究的关注方向和投入程度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最典型的例子，是三农问题的路径之争话题。在被拆迁问题取代前，还经常是占据媒体显要位置的重要公共议程，但事实上，由于中国农村的空心化，除了秦晖教授说的农民权利问题之外，所谓的三农问题早已在事实层面被无形消解掉了。

而城市新移民中最显要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只在地方被当成治安问题处理，从未真正上升到一个社会问题被系统对待研究。在巨大的治安压力下，地方政府只能在防备手段上穷尽一切努力，但只能是一场魔道之间的斗法。



虽然据广东省官方统计，近两年刑事案高增长势头得到良好控制，但却是以强化社会管控的高昂成本来实现的。虽如此，犯罪率依然触目惊心，以广州为例，抢劫案每半个小时发生一起。

即使是中国民间的社会维权人士，在对城市新移民问题的关注上，也把目光主要集中在他们与企业追讨薪水、索取赔偿等法律维权救济上。鲜见有社会工作者参与到城市二代青少年移民问题的研究调查上。

城市二代新移民在观念和社会认同上，迥异于他们被国人熟悉的父辈。无论是跟随父辈进入新城市，还是作为故乡的留守儿童，无论是他们与社会的人际关系纽带，还是与社会联系的心灵纽带，都付诸阙如。在心理归属、价值归属上，亦无从依托。

而他们父辈停滞于城市化进程中半途的尴尬，使得父辈的职业和生活方式选择天然不足效法，无法提供奋斗的榜样，也由此，父母失去了在他们人格塑造和养成中的示范作用。在失去家庭道德权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融入城市上，本身就难于当地同龄人，而无法顺利进入社会，则极容易产生反社会倾向。

考虑到真正的大规模城市化，始自 1992 年以后，中国城市形成一个高犯罪率的漂浮年轻人群，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他们只是分散的破坏力量，一旦外部经济大环境恶化，极易形成巨大的社会破坏性力量。

制造业大国的隐忧

潮州古巷骚乱事件背后的劳资关系、当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其实也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隐忧。

还在中国刚加入 WTO、制造业的巨大能量还未释放出来之时，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就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现一个不容乐观的现象。中国制造业的工人流动性极大，绝大部分人在一个企业只会呆待上 2、3 年，生产线上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熟练工。企业也完全不愿意花钱培养高技术工人。



而日本、韩国都经过与中国相似的承担低附加值产品制造的国际分工阶段，但企业通过终身雇佣制、年功累进制等方式，与员工形成了极为紧密的联系纽带，形成了其独有的“爱社如家”的东亚企业文化。

这种紧密的企业与员工关系，使得日韩企业能不断快速升级和技术追赶，在全球化竞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技术和品牌竞争力。反观中国，20 年来企业的竞争力依然建立在对丰富人力资源的依赖上。在计划生育效应开始显现、沿海终于出现用工荒之前的 10 多年里，沿海工厂工人长期无增长的收入水平，实际是相对下降的。

虽然中国工人以其特有的勤奋耐劳和心灵手巧，使得“中国制造”迅速占领世界市场，但迄今为止，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热爱企业、热爱工作的文化和观念。责任感是依赖严苛的管理制度，而非一种自主自觉。

正是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只在中国才出现了富士康式的管理奇迹—把生产链条拉长到了极限，把每个工人的动作简化到了极限。同时又使员工的生产成就感被降到极限。

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制造业整体工人技能的，是有“技能奥运会”之称的国际技能大赛。这个中国从来无人参加，也少为人知的大赛，在半个世纪来，金牌榜上的大户始终不出欧洲的瑞士、德国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这几家。金牌榜上的位置正与其全球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对应。而它的社会基础是这类需要耐心细致和热爱的体力工作，普遍被国民认为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生活和价值，而在中国的社会观念中，体力工作显然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应当去追求的。

中国另一隐忧是，支撑起中国制造业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产业一线时，中国将逐渐面临产业工人大军后继乏人的窘境。无论是跟随父母生长于第二故乡的年轻人，还是留守故乡长大的一代人，他们都不再具备物资匮乏年代的吃苦精神，对生活追求上，他们自动向城里的同龄人看齐，在财富的追求上，他们缺少了典型中国农民的精打细算长远规划的意识。

中国的制造业与潜在的劳动力大军，很快将出现难以对接的窘境。

中国制造业的勃兴，除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优势外，还离不开地方政府帮其摆平和压低社会对企业谈判和要价的能力。在这种制度和社会环境下，最具适应性的，自然是能最大限度利





用这一优势的企业。制度环境与企业的互相作用，最终强化了目前中国上亿制造业工人始终处于高度流动性的格局。

鸟笼关不住，毕竟南流去

潮州和增城的骚乱虽然在规模和破坏力上远不及洛杉矶骚乱，甚至也远不如巴黎骚乱，但不意味着中国社会蕴藏的破坏能量更低。毕竟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国家机器的威慑力，是美国和法国远不能比的。

如果以社会治安问题作为间接的衡量指针，广东珠三角地区在犯罪手段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表现出的社会问题或许远在洛杉矶和巴黎之上。更可忧的问题在于，由于发展转型中的城市病并未被列入社会领域的重要关注对象，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问题甚至缺少基本的统计调查。

仅从骚乱事件爆发后的记者调查看，本地人与外地人如此壁垒分明的对抗意识和矛盾，确如当地人所说，是迟早要爆发的。

尽管从经济学角度看，新移民的涌入，无疑增益了双方的福利。但从感知上，却截然相反。对本地人来说，外地人的到来，不但带来了严峻的治安问题，还挤压和破坏了其熟悉的生活环境，经济发展水准上的时间差，必然会让本地人歧视外地人；而外地人则不但认为自己是受剥削者，更会因无时不在的歧视，心生不平。

制度环境的缺陷，也远非户籍制度所包含的一系列权利的不对等。某种程度上，社会缺少自治能力、缺少发达完备的社会中间组织，以及义工性质的社会工作者，带来的社会隐患和治理难度更多。

因为新移民群体在组织上和社会纽带上的真空化，几乎必然要为单一的同乡会和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填补。这类组织渗透得深，则会加剧青少年犯罪现象，这类组织渗透影响得不深，则容易出现无约束的弥漫性暴力。



太多社会学证据证明，即便是两个有传统仇恨渊源的群体杂居相处，有发达的组织和民间自发秩序权威时，也能通过可靠的调节渠道和机制，及时制止暴力冲突，消解矛盾。

潮州和增城的骚乱，暴露出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已形成高危社会的苗头。根本的治理之道选择有二：

其一，回到过去，将所有游离出封闭式体制的人群重新纳入体制化的单位社会。但此路与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相违，毕竟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史证明，人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才是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之源。

改革开放之初，曾有过“鸟笼经济”之争，鸟笼论者主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以计划手段完成农业人口向城市化的转型。但实践无情地粉碎了这一良好初衷，自发的产业分工布局、市场和地缘便利，使得工业自动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当年中西部省份用于承担转移农业人口的乡镇企业大部分灭亡，只有高污染、高能耗的少数行业得以生存。

“鸟笼论”唯一留下来的顽固痕迹，恰是今天最为人诟病的户籍制度，和以体制划线的身份制度。它与市场经济所需的人口自由流动格格不入。计划经济下僵化的“鸟笼”思维，还体现为涌入大批移民的城市，由于编制限制和行政级别的设定，无法灵活地按照实际需要提供起码的公共服务和秩序维系力量。

其二，彻底打碎体制上的“鸟笼”残余，不但要逐渐开放户籍制度，使城市居民无论新旧，均可在公共服务、社会权利上享有平等地位，还要在制度设计安排上，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社会自治能力等多个领域，能跟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际需求。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病症，既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也有制度留存的历史包袱和障碍，既是社会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纵观各国的经验，它需要靠时间来消化稀释，但更要靠技术性的社会手段和政治手段来解决。

在社会手段方面，应动员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各种资源和力量，研究群体矛盾和冲突的社会问题，变无序分散社会为有机社会，建立起防止个体冲突瞬间变成群体冲突的防火墙；在政治手段上，可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上，创造外地人与本地人同等机会，将无序的利益诉求纳入体制化的解决途径，化丛林式利益博弈为参与式博弈。



如此，才能将处于体制化组织之外的移民群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地纳入体制化系统中。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建立现代国家的社会认同。否则，数量巨大而极易孳生黑社会和暴力团伙的新移民群体，会在出现经济危机时，成为引发剧烈社会震荡的暴力之源。

（徐佳，凤凰周刊记者。黄章晋，作家，凤凰周刊执行主编。本文首发于《凤凰周刊》。原文链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7/15/7711021_0.shtml）

【返回目录】

【评】

8-6 张天藩：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背后的社会症结



“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更多的 人成为市民，融入城市，公平地获得城市化的好处。而不是相反地，攫取与牺牲多数人（外来人口）的权益，来成全少数人（城市户籍人口）的专属优待。”

自 6 月中旬起，北京大兴、朝阳、海淀等区有 24 所自办校被拆迁，涉及学生 14000 余人。这一变动一经媒体报道，立刻引发广泛关注。再加上与此同时，一个名为“中非希望工程”的慈善项目计划耗资 20 亿元为非洲捐建 1000 所希望小学。这在本国失学儿童大量存在的背景下，且与北京关停如此之多的自办学校同时传开，对比之下，难免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质疑。但事实上，一个是政府行为，一个是民间行为，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件事。

就关停学校一事，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做法不人性化，显得轻率和粗暴，缺乏一个完整的前期规划方案，应该至少在保证这些学生有学可上的前提下再去关停这些学校，才比较适宜。但就关停学校之事的本身来说，它是必然的，因为其有着深层的社会根源，是大势所趋。



一、作为严限人口进入工具的关停举动

首都北京，这个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以其自身强大的引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中国社科院 7 月 18 日发布《2011 年社会建设蓝皮书》指出，2000 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年均增长 70 万，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可能还将延续至少 20 年。另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达 1961.2 万人，与“十一五”末期常住人口控制目标 1625 万人相比，多出 336.2 万人，相当于多出一个大型城市的人口，同时更是已突破规划中的 2020 年常住人口总量为 1800 万人的上限。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压力之下，各种问题就相应而生，教育自然就作为了重中之重的问题。

在 1998 年 3 月，国家教委、公安部出台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允许社会力量简易办学，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允许其租赁坚固、适用的房屋为校舍。这无疑是顺应了当时整个社会流动加剧的形势的，解决了大量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问题。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样的管理办法，已经开始被很多地方摒弃了。2002 年 4 月，北京市教委制定了《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办法中并没有简易办学的说法，取而代之的是“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可以参照本市的办学条件标准，在报经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后，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学校。”

2008 年 12 月，北京市教委和财政局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到，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工作遵循“政府负责、齐抓共管、公办为主、依法规范”的原则。对具备一定办学规模、无安全隐患、办学思想端正的自办学校，促其尽快达到办学标准，并纳入民办学校管理。而这些正是此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指导思想，逐步地加大了对自办的学校进行清理。当前北京还有 100 多所不符合办学标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对待这些学校，不同区县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政策，但陆续关停、分流学生，乃是一致的政策方向。

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是这些学校被关停的共同的官方说法。但很显然这经不起推敲，因为这些学校，有的已经办学十年了，有的去年还是“规范保留学校”，今年就要被关停。而且这个关停行动开展之前，并没有做出一个被社会接受的公开方案。这违背了北京市《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文件的意见》，意见中明确规定，对擅自开办且严重不达标的学校和超过期限未达标的学校，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提出撤销意见和方案，由所在区县政府批准并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实施。撤销前要做好各方面工作，将在校生妥善安排到其他学校继续就读，保证其学业不受影响，维护社会稳定。

现在对于很多城市管理者来说，他们面临着一个悖论，如果他们没有解决好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他们会受到多方批评；解决好了，又将导致更多打工子弟涌入。于是限制或关停民办学校（即不解决好打工子弟教育问题），就成为调控人口的最佳工具之一了。可是最终这个的举措效果甚微。人口日益增长的北京以及其他大城市，都同样地陷入了一种尴尬处境之中：作为超负荷运转的超大型城市，它不想再继续快速地人口增长了，于是各种限制外地人口进入的政策纷纷推出；但由于其自身不断强化，大量资源快速地集中进来。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好，就必定会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在加上执政者的城市化冲动（此次关停学校的背景就是“今年随着北京城乡结合部拆迁整治的推进”），无法遏制城市扩张的这种自我膨胀的态势，最终就陷入了一种不堪重负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争议的真正焦点在于教育起点公平

教育公平可以细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如果说统一高考算作是相对的教育结果公平的制度，那么让每个适龄孩子都能有学可上，则就是最起码的教育起点公平了；而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好的学校学习，则是过程公平。打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之间，涉及到了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当面临着学校被关停、学生们无学可上的时候，教育起点公平问题，急迫地成为考量与审判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重要的坐标。人们担心，政府不但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还去破坏现有的秩序，这样起点公平就更难实现了，而随后的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也便不能无从说起了。



面对人口的涌入，适龄儿童入学问题，让北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 8 月 16 日下午北京市教委就打工子弟学校关停事件做出回应的会上，公布了目前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总数为 43.37 万人，其中 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不足 10 万人在自办校就读。而且还有数据显示，2012 年北京将迎来近 10 年来小学入学的小高峰，届时，适龄入学儿童将接近 20 万人，其中，具有北京户籍的约有一半左右，考虑到有部分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小学入学人数和初中入学人数将高于上述两个数字。

当然，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北京，可以说现在是所有城市的通病了，而北京仅仅是最具代表性的“集大成者”而已。例如，就有公开资料显示，2008 年广州市有流动儿童近 47 万人，其中仅有 19 万人在公办学校就读，剩下的 29 万人都在民办学校上学。

毋庸置疑的是，当公办学校容纳不了这些学生的时候，那些游离在政府直接管辖之外的自办学校，尽管身处于灰色甚至是黑色的地带中，但却有着其合理性，弥补了教育资源因为人口激增之后带来的巨大缺口。长期关注北京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秘书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就认为，在目前教育体制严重、教育职员配置严重不适应的情况下，打工子弟学校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因为在公立学校无力解决这些孩子的入学问题的时候，毕竟是它们使得很多孩子免于失学，至少在最次的选择上，保证了一个基本的教育起点公平的机会（离真正的公平还有很大差距，因为从软硬件的设施上，这些学校都远远不如公办学校）。

很大程度上，在很多城乡结合部村的打工子弟学校，更像是一种市场化的民间办学，学校与学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竞争关系，也有着不断将学校办得更好的自身意愿。因此，只要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管，并非不能将其容纳到相应的管理体系中。而且如此，可较好地解决教育资源极度紧张的局面，而非一关了之，然后让一些学生不得不面临无学可上的尴尬。

此外，很多地方也如同北京一样，设置了诸如“五证齐全方可转入公立学校”的高门槛。所谓“五证”是指，家长或监护人的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这些繁琐的设置，对于大多数从事低端工作的家长来说，是一道高门槛，因为如果他们能够解决好这些的，其实早就没有必要还在打工子弟学校了。随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北京市教委提出的“三先三后”原则





（即先拆民居，再拆学校；先有工作安置分流方案，再组织具体实施；先分流安置，再拆校舍）和“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的承诺，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且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入学，一场风波才渐渐消停下来。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表面上看，很大程度上只是涉及到那些相对来说较为底层的一些打工者。但实际上，如此雷同的遭遇却不仅仅只有底层的打工者。大量社会的中间阶层群体，也感受到了这种为子女教育问题上的憋屈，比如遭遇收取以“捐助”为名的择校费、异地高考的时间表迟迟不出来，这些问题都成为许多家长心头很大的愤懑。因此，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就相应地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大家会站起来抗争，为自己的孩子尽可能地争取教育的起点公平，捍卫自己子女的公平教育权利，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舆论压力

这些年来，人们在不断地反思教育起点公平的问题，很显然，其重要比结果公平来的更加重要。正如这些年一直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我奋斗了 18 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一文所讲述的，“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这背后，就涉及到了中国多重的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

三、多重资源分配不均与城市的发展伦理

人们往往把户籍制度作为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难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户籍也仅仅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罢了。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户籍制度横亘在中间，问题还是同样存在的，因为只要中国多重的资源分配不均现状未得以好转，这些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多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主要体现在区域与城乡，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了大多数优质教育资源，而农村和边缘贫困地区则相对稀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了。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是，在同一个城市的义务教育、中等、高等三级教育阶段之间，还有同城同级的不同学校之间，分配不均也是很严重的。就在很多舆论关注关停学校的同时，另一条消息好像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它与关停学校一事联系起来去看，可以发现其中有着深藏奥秘。



8 月 15 日，北京 44 个部门在各自官网上公布“三公经费”，其中市教委以去年“三公”消费 1.34 亿元居首。此外，在去年，北京市教委公布的 2010 年部门预算显示，用于教育支出的费用是近 125.4 亿元。

于是，问题就来了，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亦曾经透露，2003-2010 年，北京全市财政用于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约为每年不到 1 亿元。按照北京现有的管理体制，北京市一级是不管中小学的，市财政局只管理市属的高校，所以大量的教育经费就落在了区县的头上，但尽管如此，据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的报告，近年来北京市和区县财政每年用于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也才 10 亿元，这些总共加起来，占总的教育支出费用也不足 1%。

一边是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的投入，高达 1.34 亿的“三公”花费，一边是如此之多打工子弟无处上学，两个新闻放一起对比，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而且在 2011 年的预算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与公务接待费用，都在增长，这些增长据官方的解释，是因为市属高等院校的国际学术交流及国际会议，以及各种学术交流和涉及教学、科研、管理的检查评估逐年增加。也就是说，那些增长的花费，并不会真正地投入到务实性质的教育本身之中，更多的是教育的“务虚”投入。这样的投入并不是说不能有，但在义务教育阶段面临如此情形之时，高昂的高等教育“三公消费”无论如何都在刺痛人们敏感的神经，也反映出教育体系中不同层级的严重分配不均问题。

在花费高企的高等院校与惨淡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之间，不管是从教育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基础义务教育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哪怕多投入一分钱，就可以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此事关停学校事件中，被广泛引用的有两句话，一是雨果所说的“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二是马克·吐温说的“你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两个人所表达的虽然有些危言耸听，但结合中国的当下现实，这并非无稽之谈。近年来的各种调查都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呈上升趋势，且低龄化趋势明显。北京顺义法院最新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2010 年 1 至 10 月，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部刑案被告人总数的 39%，较上一年同期增加 60 .7%。让不分身份与地域的适龄孩子在每个城市都能够有学可上，享受到一个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的权利，如此他们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哪怕不能保证每

个学生都学有所成，但起码有可能让更多的人成为一个有更高知识文化程度以及人格健全的公民，而不至于走入歧途。

通过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这样一场风波，去窥视其中深层的社会症结，以此能够从更加全面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当下各个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中国不可逆转的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必然会大量地增加，这不仅是实现更高城市化程度的必要条件，也是城市化的应有之义，因为城市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成为市民，融入城市，公平地获得城市化的好处。而不是相反地，攫取与牺牲多数人（外来人口）的权益，来成全少数人（城市户籍人口）的专属优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应该以更加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去经营城市，将城市的公共服务真正无差别地公共化，完成城市自身社会责任的升级与蜕变。而这一切，第一步无疑就是要让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能够享受到他们应有的受教育的公平权利。这不仅事关中国教育的发展，更事关中国公平的社会事业建设与我们国家的未来。

（张天潘，《南方都市报》驻京评论记者。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63519）

【返回目录】



8-7 盛洪：谁有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权力？



“一方面，是大量打工子弟学校的员工在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使数十万打工子弟免于失学的损失；在另一面，是手握公权力，吃着喝着纳税人（包括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血汗，却几次三番地要关闭这些可能缓解打工子弟上学难题的学校。”

近日，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一口气关闭了五十多所打工子弟小学和幼儿园，但最令人震惊的还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选择的这个时机：竟然在社会关系日趋紧张、执政党的声誉已大受贬损的时候，做出这种古今中外都非常罕见的恶行。我们也惊叹这些官员的耻辱感已经麻木，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背上“赶学生、拆学校”这种反教育反社会的大耻。

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谎称，那些失学的孩子可以全部被分流到公办学校，但孩子的家长们发现，等待他们的是要办好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等所谓“五证”。把“五证”作为中国公民孩子受教育的前提，也就是把这个神圣的权利放在了行政部门自己规定的“许可”之下。其实，真正该拿出来证明的，恰恰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自己：关闭别人的学校、禁止别人办学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假定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教育，尤其是初级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所以政府有某种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叫做保证全中国所有孩子的起点平等。因为有某些家庭的收入较少，不足以支持孩子上学，从而最需要公共机构的扶助和支持。我们假设，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在花费纳税人的钱成为一个机构的时候，它的义务或职责，就是向在其境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尤其是弱势公民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北京市境内的中国公民”是否包括那些到北京来打工的外地人或农村人呢？显然包括。因为他们来到北京工作是他们的宪法权利。这种权利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被剥夺，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居民跨城乡、跨地区的流动已经成为常态，流入人口已是一个地方的正常且合法的居民。一个地方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各项公共服务，当然包括教育上的辅助或资助。《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那么，北京市地方政府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了吗？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 90 年代到今天，到北京来工作的外地人和农村人成千上万，他们为北京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为所有这些人的子弟提供了充分的教育服务吗？对此我并不掌握全面的信息。但我可以通过一些事件反证，它没有履行它本应履行的义务。那就是，它不止一次关闭打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在北京已经创立并教学了很多年。例如媒体披露的红星小学，就在北京设立并教学了十二年。我们试想，在这十二年间，若没有红星小学等打工子弟学校的努力，在北京的数万以至数十万孩子岂不没有学上了吗？而这些学校的存在不正是对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未履行自身义务的一种补救吗？

令人奇怪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没有向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提供它应该提供的服务，不但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批评和惩罚，反而理直气壮地指责这些弥补它过错的民间学校来了。一个地方政府如果想推动教育的发展，是可以鼓励民间力量来办学的，但如果民间有困难，它就应施以援手。而在民间办学中，为富人子弟办学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不须为经费发愁，但为穷人办学就相当困难。在印度，有大量为穷人子弟创办的私立学校，他们提供了社会大部分儿童的教育服务。例如在海德拉巴市，有 61%的孩子在未接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上学。这种穷人学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扬。从这个角度看，十几年来在北京挣扎奋斗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及其教师，是令人敬佩的教育英雄；但在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眼中竟一文不值。我不知还有什么比这更颠倒黑白、恩将仇报了。

当北京市教育当局指责这些学校没有资质的时候，它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不正是它自己的过错吗？所谓“没有资质”，就是因为这些穷人学校的财务捉襟见肘，不能聘用高素质的教

师，添置充分的设备，以及租用更坚固和宽畅的教室。难道这不是教育管理当局应该出手援助的地方吗？然而尽管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手握巨额公共教育经费，却对关乎穷人子弟的学校一毛不拔，自我设立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所谓办学许可，反将它不履行义务的结果当成它关闭这些本该表彰的学校的理由，这不是太过荒诞了吗？

最重要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误以为自己有权力关闭这些学校。翻开中国宪法，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创办学校是中国公民的天赋权利，行政部门只有帮助他们的义务，至少不能妨碍他们。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没有一条规定行政部门有限制公民自由办学权利的权力。

实际上，行政部门控制教育只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面操控整个社会的体制的一部分。实践已经证明，这种体制既无效率、又不公正；改革开放对这种体制进行了宪政层次的纠正。在大多数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政府还权于民，裁撤了大量管制经济的行政部门，人民有权自由创办企业，从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一奇迹又印证了这一宪政原则，即人民才是行政部门各项权力的宪法来源，后者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反过来限制它的政治委托人。很显然，北京市教育当局自我授权、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是一种僭越权利的狂妄举动。

最后，我们承认，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有关“资质”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是谁的资质有问题？这一事件也暴露出了“不合格”的机构，但关键在于，是哪一个机构不合格？我们也看到了“危房”，关键在于，是哪个房屋里有真正的危险？一方面，是大量打工子弟学校的员工在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使数十万打工子弟免于失学的损失；在另一面，是手握公权力，吃着喝着纳税人（包括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血汗，却几次三番地要关闭这些可能缓解打工子弟上学难题的学校。到底是谁推进了北京市的教育，使更多的人得到了教育；又是谁在破坏北京市的教育，使大量的学龄人口失学？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的这一行为不仅给打工子弟上学造成了困难，更是在颠覆有关公平与教育的宪法原则，挑战社会正义与良知的底线。这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滥用公权力现象达到的新的高度。他们敢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他

们有恃无恐——规定他们义务的《宪法》和《义务教育法》不能有效实施，用来对他们加以惩罚。然而正因如此，宪法就无法落地；就会鼓励其它地区和其它行政部门也起而仿效，最终瓦解中国的宪法原则。所以，中国社会已经到进行宪政改革，保卫宪法，阻遏宪政崩坏的加速度的重要关头了。

即使在今天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违宪诉讼和违宪审查的有效机制，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也是可以有所作为。我呼吁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采取果断举措，严惩北京市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撤消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以表明自己维护和捍卫宪法原则、打击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的坚定立场；由此扭转宪政崩坏的势头，证明政府的存在符合人民设立它时的初衷，以及执政党有政治合法性继续治理这个社会。

（盛洪， 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0578?page=1）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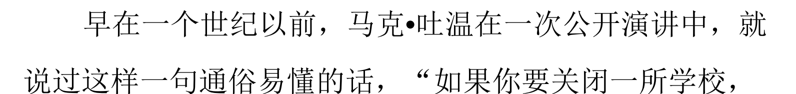


8-8 柏蔚林：警惕中国模式下的贫困陷阱

“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却是建立在不断加深的贫困陷阱之上。……面对这样的悖论，谁也无法否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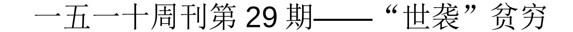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马克•吐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说过这样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如果你要关闭一所学校，就要准备修建一座监狱”。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心智健全的人民，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技能高超的劳动者，产业转型、经济持续成长就只能是南柯一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在 1982 年裁定，任何州或者学区都不得拒绝给学龄非法移民儿童提供基础教育（K-12），否则属于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美国之所以会对教育如此重视，甚至上纲上线到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教育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缺乏良好教育的下一代将是整个社会的灾难。直到今天，即便在美国经济已经身陷困境，对于非法移民占用教育资怨声四起的情况下，那些父母没有合法身份的儿童，也仍然可以接受完整的免费义务教育。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号称自古至今一贯重视教育的礼仪之邦，在新千年已经过了第 1 个 10 年的时候，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仍然在通过行政手段，大规模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甚至幼儿园。据媒体报道，受到影响的学龄儿童高达上万人。虽然当地教育部门面对社会的舆论压力，也表示要全部解决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但选择在学校开学之际关闭大批学校，而且重新入学手续繁杂，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学生失学在所难免。在事实上，近多年来，北京地区以各种名目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行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行政命令关闭学校是很容易的，但似乎为政者并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在学龄阶段缺乏正常的教育，将如何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是无需多加解释的。如果假定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是可以被忽视的，那么将这样的效果放大





到整个农民工下一代身上的时候，谁也将无法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同时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陷入“贫困陷阱”的人群。而这一现象将带给中国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就如同一个处于绝望中的人会以什么样的举动来反馈社会一样，都是无法想象的。

“贫困陷阱”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界针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就是一些经济体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陷入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善经济状况的境地。欧美发达国家在早期对于亚非拉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过程中，主要的手段是给予金钱和物质的援助。但是后来发现收效甚微，有些国家在经过了多年的援助之后，经济仍然没有任何起色，反而要完全依赖于西方的援助，否则就会立即陷入混乱。后来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重新检讨了先前的援助理论，认为援助不能自上而下进行，直接给钱给物资是没有用的，必须直接帮助当地人民建立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也不能不承认，减贫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贫困产生和延续的背景都是极其复杂的，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含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贫困陷阱”作为一个概念被创造了出来，用于解释这种身陷贫穷困境却无法自拔的境地。在学术界中，关于是否真正存在所谓“贫困陷阱”的争议一直在学者中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中国农民工子弟的遭遇，恰恰证明了这种“陷阱”的真实存在，而且是存在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农民工以及其身后的农村社会，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被大肆宣传的“中国模式”。但是由于二元社会制度的存在，使这个中国最大的人口群体一边在创造着世界经济奇迹，一边却基于种种人为制约而无法摆脱自身贫穷的命运，每年甚至还会出现大量的“返贫”人口。

在 1991 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期世界贫困问题报告，在其中“贫困”的定义基本上是简单地按照收入来划定的。而到了十多年之后，当世行出版了另一份关于世界范围内“贫困”的报告时，主流经济学家们终于承认了“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数字就能解释的概念，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解释，“贫困”源自于权利被剥夺。面对中国在近多年炫目的经济成长数字，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无论是以“休克疗法”闻名的杰弗瑞•塞克斯，还是与其观点相对的 MIT 的威廉姆•伊斯特里，在其著作中均把中国经济模式作为了正面的典型来引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统统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二元社会中，由于户籍制度的存



在，有着一个极其庞大的人口，被人为剥夺了多种基本的权利，而深深陷入了中国特色的贫穷困境不能自拔。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和一些国际组织为如何定义贫困线而纠缠不清。如果按照国际上的定义，在这个拥有着世界第二大 GDP 的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经高达上亿，而这些贫困人口的分布，都毫无例外集中在农村地区。究其本源，生身为农家子弟，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巨大城乡差异，再加上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被随意剥夺，无法跟上社会进步的节奏，地位被固化在社会最底层，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贫困陷阱”。

为什么这些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会忽视了中国社会里如此重大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很好解释的。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旅行，往往被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奢华所震撼，因而认为“中国模式”乃是第三世界的出路所在。比如当杰弗瑞•塞克斯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所接触的，多是一些要在有钢琴师伴奏的高档餐厅里用晚餐的中国人。此时此刻，他当然不会想到那些聚居在民工棚里或者蜗居在地下室里讨生活的所谓外来人口。所以他除了按照惯例对中国的一些所谓敏感话题做了轻描淡写的批评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中国奇迹的感慨和盛赞了。没有出现如拉美、印度城市里一般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成就，也为这些国际知名学者所称道。然而事实并非如那些五年十年甚至百年的城市规划蓝图那样的美妙。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村人口无法在城市定居，只能成为所谓的“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在不被需要时随时可以被驱逐，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不会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现象。在不久前深圳就一次清理了数万名所谓“无正当理由”的外来人员，来保证自己城市的光鲜形象。

然而为政者需要明白，当弱势人口可以被政府随意以强力清理的时候，现实中的贫穷却是无法被轻易消灭的。简而言之，当中国的城市以没有贫民窟为豪的时候，贫穷在实际上是被转移到了乡村，贫民窟并非只是拉美、印度才有的特产，在中国只是以另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每年春节因为买不起火车票而只好驾驶摩托车返乡的农民工长龙，就是城市如何向乡村输送贫穷的经典象征。近年来随着知识界乡土田野调查的广泛进行，伴随着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正在一点点的向世人展现出来。梁鸿所著《中国在梁庄》和阮梅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就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比现实的贫穷更可怕的，则是陷入了“贫困陷阱”，永无翻身之日。我在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统计报告，经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农民

工的平均文化水准大致在小学到初中的阶段，而且多年没有提高。长期以来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是人所共知的，而现在连农民工下一代也要遭遇与父辈同样的命运，在知识爆炸、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一个在学龄而不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儿童，将来会有多少机会能在未来的社会立足呢？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在二元体制下，他们一生注定要成为社会最低层的简单劳动力，看不到半点改变人生的希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事情吗？

正如盛洪先生最近撰文指出的那样，就在北京教育当局推诿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原因于办学资质和条件不足时，他们为什么不能反省一下，农民工子弟小学为什么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来改善办学环境呢。而郭宇宽先生的调查，则反映出了农民工子弟学校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当社会舆论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遍同情的时候，这些学校本身却成了一些人利用社会大众的同情心，为自己个人谋取巨额利润的工具。无论是何种情况，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弟都是最终的受害者。当然，作为二元社会受益者的城市居民也并不能超然事外。从这些年日益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频发的农民工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以及其他所谓困扰城市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马克•吐温早在 100 年的那几句话的确是真知灼见。就在不久前广东某地当地人与川籍农民工发生大规模冲突之后，曾经有人预言，随着“农二代”的长大成人，作为一种无法忽视的新生社会力量，中国社会早晚将见证一个“城市内战”的时代。相对于民间人士的睿智，最近出版的代表官方意见的人权蓝皮书，却仍然把日益严重的农民和乡村贫穷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自然灾害、重大疾病和环境因素”。很显然，在对“中国模式”的赞誉甚嚣尘上的时候，其背后核心的二元社会制度正在如何从根本上毁掉这个国家的未来，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住了。而这，是真正值得每一个关心这个国家民族未来的人去关注的。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却是建立在不断加深的贫困陷阱之上。黄亚生教授曾经感叹，从 90 年代中期向后 10 年里，上海增加了 3，000 座高层建筑，而中国增加了 3，000 万文盲人口。面对这样的悖论，谁也无法否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奇迹。

（柏蔚林，1510 博客作者 。原文链接：http://my1510.cn/article.php?id=64613）

【返回目录】



【FMN 一周新闻综述】

1、本周 8 省发生严重秋汛引发洪水

9 月以来中国多个省份遭遇特大洪水，上千万人受灾，其中 9 月 18 日四川平昌因洪水导致全城被淹，7000 多户停电。还有居民被困在房顶而通过微博呼救，在经过 14 个小时之后 19 日凌晨放被救下。当地居民还通过网帖交流发布求助信息。

新闻：http://fmn.cc/qg7bmH
http://fmn.cc/pSfVO2

据 9 月 20 日民政部网站的最新消息，9 月份以来的中国局部地区的连续降雨，导致渭河和汉江流域发生秋汛。目前已造成四川陕西河南湖北等 8 个省市的 2156.6 万人次受灾，其中有 70 人死亡，32 人失踪。

新闻：http://fmn.cc/nc01tt

西安市灞桥区因 9 月份以来的连续降雨在 17 日发生山体滑坡，垮塌土方量达到 24.8 万立方米，导致瑞丰空心砖厂和奇安雁塔陶瓷公司部分车间被埋。截至 21 日 17 时，此次坡灾害已造成 27 人死亡，目前还有 5 人失踪。

新闻：http://fmn.cc/q6gXLv

2、各地独立参选人

兰州参选人薛崔愿（@兰州人余男）在 9 月 15 日记录了他所在的兰州市城关区第七选区的投票过程，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他还是决定以“另选他人”方式参加选举，当晚临近午夜被告知他得到 10 票而落选。

新闻：http://cn.fmnnow.com/?p=354

在广州和兰州的独立参选人结束征程之后，北京的参选人们也迎来了考验。9 月 16 日北京参选人徐春柳在其居住地居委会进行选举登记时，因他不是所谓“纯居民”而遭到拒绝，为了不影响后续的选举进程，他当日下午即向单位提出辞职，准备参选到底。

新闻：http://cn.fmnnow.com/?p=346

北京的 13 位联合参选人之一的郑威女士原定 16 日上午举行选举宣传活动，结果活动未开始郑威便被景山派出所带走，直到当晚 7 点才回家，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其他多位参选人，警方也未说明带走他们的原因。

新闻：http://cn.fmnnow.com/?p=349

3、重大考试泄密

9 月 17、18 日是据称中国最难通过的注册会计师的考试时间，开考前考生信息遭到泄露每日都会收到真题出售短信，据部分考生介绍



考试前真题的试题和答案就在网上出现，疑遭泄题。

新闻：http://fmn.cc/re059F

9 月 18 日下午举行的国家司法考试中，有网友上传手机短信截屏照表示在开考前 2 个小时就出现了考试中的大部分考点。频繁的职业考试泄题事件打击了考生的信息，也让有关部门的公信力遭受了质疑

新闻：http://fmn.cc/p48wV2

4、其他热点新闻

9 月 15 日到 17 日晚间，浙江海宁市红晓村数百名村民聚集到当地一家名为晶科能源公司门前抗议污染问题，并遭到了当地警方和该公司保安的殴打，此前采访当地记者采访时也遭到殴打并砸毁机器。最终官方要求该企业停产并罚款 47 万元，但当地居民表示对结果不满。

新闻：http://fmn.cc/nxM90U

9 月 18 日到 19 日，妙觉法师和刘沙沙等人前往山东东师古村探望维权律师陈光诚，当她们二人走到村口时遭到不明身份人士袭击，并被蒙头、身上财物也遭抢，最终被分头弃之旷野，数小时后才得以同外界取得联系。

新闻：http://cn.fmnnow.com/?p=366

新浪 CEO 曹国伟在 18 日的媒体大会上有关加强对微博谣言监管的消息传出后，新浪美股在周二出现大跌蒸发 10 亿美元，并出现微博将被关停的谣言引发用户关注。

新闻：http://cn.fmnnow.com/?p=408

蟹爸杨海鹏在微博上为妻子梅晓阳被诬受贿案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此案 9 月 19 日开庭审理，庭上曝出的有关检方刑讯逼供等消息再一次引爆了微博，以下为 FMN 对当日庭审的总结。

新闻：http://cn.fmnnow.com/?p=415

由于此前有消息称 9 月 15 日有关 7.23 甬温线动车出轨事故调查报告将出台引起了广泛关注，9 月 21 日调查组通报了有关调查进展的情况，通报中告知了民众工作组的工作内容，指出由于工作量巨大，报告出台仍需时日。

新闻：http://fmn.cc/pm3JZc

2010 年 6 月，徐悲鸿的一副画作卖出了 7280 万元的天价，该作品还得到了其长子的认证。但在 9 月 15 日，中央美术学院首届研修班的部分学生联名声称，该幅油画是当年他们的习作，并不是徐悲鸿所作，并公开了 5 幅同天价油画十分相似的习作。不少行家认为这显示出拍卖行业的不规范。

新闻：http://fmn.cc/nF4kge



中国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 20 日表示，煤矿安全创出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他随后举出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中国发生（煤矿）事故 778 起、死亡 1244 人。

新闻：http://fmn.cc/qLQE8w

地沟油流向全国百姓的餐桌时，新华社记者到浙江的无污染山区调查发现该省甚至上海的不少权利机构和部门，在此建立了专有的绿色农供基地，并要求养殖时不加添加剂和农药，并且产品要按时直运到这些机构。该报道随后被删除，我们保留了截图。

新闻：http://fmn.cc/o4IHdQ

截图：http://fmn.cc/oZSePu

湖南卫视 2011 年的“快乐女声”落下帷幕后，负责人表示广电总局要求他们停止明年举办群众参与的选拔类活动，此前湖南台台长因多个节目被认为存在问题而被广电请去谈话。当天广电网站上还通知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节目道德观扭曲，要求其暂停播出 30 天。

新闻：http://fmn.cc/nYVBAN

http://fmn.cc/pAwXed

在 9 月 13 日召开的重庆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上，市委书记薄熙不仅批评“和气是福”论，还说：“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尽管外表光鲜，实则危机四伏，贫富差距已经很大”等言论公布后在网络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新闻：http://fmn.cc/nAQvQk

【返回目录】



➢➢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开始于 2009 年 8 月，每月在香港举办一场公开讨论，并借助网络视频直播、文字直播等方式将现场放大至全球任何地方。我们希望提供独立、客观、理性的观点和论述，并关注被主流媒体忽略的议题和讨论。目前已举办二十二场讨论，嘉宾有艾未未、长平、陈冠中、贺卫方、胡泳、梁文道、欧宁、潘毅、叶荫聪、周保松、许宝强等。2011 年 6 月开始，为了丰富论坛的主题，我们在固有论坛的基础上开始一个 Co-China X 系列，这些讨论、沙龙由 Co-China 同一些友好团体合作举办，试图将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呈现于网络。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请发一封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subscribe@googlegroups.com，也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想加入「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的志愿者团队，请发简历至 forum@cochina.org。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org/
论坛 twitter：Co-China 論壇（http://twitter.com/#!/CoChinaOnline）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t.sina.com.cn/1729620664 ）

编辑：柏蔚林 姚梧雨童
主编：方可成
版面设计：豆弟
配图：王琳
技术支持：毛向辉 舒欣
出品人：杜婷

